



杨立强 著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

上海人民出版社



杨立强 著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杨立强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ISBN 7-208-04583-6

I. 清... II. 杨... III. ①资产阶级—研究—中国—近代
②中国—近代史—研究 IV. ①D691.71②K25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16019 号

特约编辑 唐云松

封面装帧 王晓阳

清末民初资产阶级与社会变动

杨立强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75 插页 6 字数 288,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4583-6/K·1004

定价 29.20 元



杨立强 (1939.3-2002.7)，广东揭阳人。1964年8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毕业，留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1980年后相继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主任、主任，文博学院副院长等职。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撰写、发表了数十篇学术论著，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个人优秀论文奖等多项奖项。任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上海中山学社理事、上海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多项学术职务。

序 言 一

金冲及

替亡友的遗作写序,提起笔来,心里实在充满着说不出的惆怅和痛楚。何况立强是我的学生,四十年前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勤奋好学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万万没有想到他竟那么早地离我们而去。

我在立强毕业后不久就离开复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合作共事,但对他的情况仍很关心。从朋友们的转告和少数几次见面中,知道他在学校里除担任了几年历史系主任和讲授中国近代史课程外,依然勤奋地笔耕不辍。也常在报刊上读到 he 发表的一些有自己见地的论文,很为他高兴。

上个世纪之交中国转型期中社会大变动,特别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和新知识群体的兴起,一直是他研究工作中关注的重点。这是一个有着重要意义的开拓性课题。研究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历程和特点,不能不对这个重要源头进行认真的考察。

上海及附近地区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一直走在前头,这里发生过的种种变化格外引人注目,研究资料极为丰富,大多还来不及经过系统的整理。立强长时期在复旦大学工作,同有关研究单位和工作部门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从事这个课题的研究自然有着许多有利条件。他也以此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从整理出版档案资料,到组织重要的学术活动,到从事专题研究,不遗余力地推进这项工作。收入文集的《清末民初宝山的新乡绅及其领导的社会变革》、《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

等论文,写得都很扎实,注意到现代史学需要拓宽研究面,因此,发掘并使用了许多前人没有或很少利用过的报刊、档案、方志、文集等资料,进行精细的剖析,并且在图表统计上用了很大力气,从中可以看出他治学的严谨态度和深厚功夫。

立强曾主持编辑出版《张謇存稿》,还曾参加整理上海商会的资料。这些同前面所说的课题都有直接关系,但在文集中却找不到这些方面的论文。我想这大概因为立强不愿意多利用集体劳动成果来从事个人写作。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他的为人。

《粤闽赣杨耸族裔迁徙浅论》充分利用谱牒资料,从杨氏族裔迁徙这个侧面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虽同上述课题没有多大关系,但同样显示出立强对拓宽史学研究面、把社会学方法引进中国史学中来所作的试探和努力。

文集中还有一些文章,如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和太平天国、戊戌变法、清末立宪派、辛亥革命等专题研究,看来都是立强在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中对一些常常遇到的问题所作的认真思考,可成一家之言。

令人痛惜的是,立强走得太早了。他所从事的研究和探索,许多还只是开了个头。现在,把他这些年的论文结集出版,不仅是对逝者的永恒研究,也可以使生者从中受到有益的启示。

2002年12月于北京

序 言 二

薛明扬

杨立强同志,1939年3月27日出生于广东揭阳,1959年9月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1964年1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月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学专业本科,留系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其间,1980年1月至1982年12月,任历史学系副主任。1983年3月至1990年10月,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93年1月至1996年8月,任历史学系主任,同时兼任文博学院副院长。

杨立强同志对党忠诚,坚持党性原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为人坦诚,对党的教育事业忠心耿耿,数十年来,兢兢业业,甘于奉献,勤奋工作,为历史学系的教学改革、科研发展和学科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深为全系师生敬重。

杨立强同志深爱教师岗位,多年来教书育人,主讲多门历史学专业本科生基础课、选修课,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多次荣获校优秀教学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学位制度后,他担任研究生导师,承担了对研究生以及外国留学生的教学培养和论文指导,工作细致,成绩卓著,深受学生爱戴,为研究生培养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学生,现已成为各自工作单位的骨干,有的还走上了重要的领导岗位。

杨立强同志是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尤其在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和近代军阀史研究等方面,有精湛的成果问世,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他学养深厚,思想敏锐,勇于创新。

1979年,他就明确提出应充分肯定戊戌变法在民族觉醒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并对此作了详尽的阐述,学术界反响热烈,《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等都有专题介绍。杨立强同志独立或与他人合作撰写的多项科研论著,学术界给予好评,1986年以来先后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奖和个人优秀论文奖。杨立强同志与国内外学术界联系广泛,曾出访日本、韩国,参与发起组织多次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先后任上海市历史学会理事、上海中山学社理事、上海市中日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史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等多项学术职务。

杨立强同志的一生,是奉献给新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生。他对工作的敬业精神,对学术孜孜不倦的追求精神,对学生关爱有加的教书育人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目 录

- [1] 序言一 金冲及
- [1] 序言二 薛明扬
- [1] 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
- [13] 振兴中华——一面跨世纪的爱国主义运动的旗帜
- [20] 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1840—1919)
- [47] 再论近代中国的时代中心
- [66] 论“上帝教”对太平天国的两重性作用
- [83] “天国”理想和现世利益——太平天国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 [92] 青史凭谁判是非——略论辛亥革命前夕的资产阶级立宪派
- [106] 上海商团与辛亥革命
- [138] 论民国初年的政党、党争与社会
- [160] 清末民初宝山的新乡绅及其领导的社会改革
- [200] 辛亥革命后的上海农村

-
- [218] 论近代中国军阀官僚集团组织构成的特点
- [235] 中日甲午战争与清末军制变革
- [267] 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统帅机关决策幕后
- [284] 孙中山推进长江流域经济发展的构想
- [295] 华侨联合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12~1919)
- [314] 略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陈宝琛
- [331] 社会环境对现代化进程的影响——19 世纪后半期中日
两国比较研究
- [349] 粤闽赣杨耸族裔迁徙浅论
- [362] 后记

民族觉醒的一块里程碑

——关于戊戌变法评价的若干问题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戊戌变法的评价,存在着一个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承认它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百年斗争史上不可缺少的一页;一方面又竭力贬低其历史地位。有的评论甚至断言: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本身就是剥削压迫人民的“统治阶级”,这场运动所要改变的“只是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而不是它的质,其目的也只是要“阻挡人民革命运动”;戊戌变法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一条虚伪的“反动道路”。这里,提出了如何看待戊戌变法的一些根本问题,应该通过讨论,给予戊戌变法应有的历史地位。

一

19世纪6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地区破土而起,到了八九十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股新兴的社会力量。由于民族资本主义一问世就在内外压迫的夹缝中挣扎,因而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冲破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重重障碍。1895年后,终于形成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变法图强的政治运动。这是当时尚处于在野、无权地位的新兴资产阶级,向内外反动势力争权利、求生存的斗争,也是以这个阶级作为首领的中华民族反对列强瓜分,挽救民族危亡的一次

尝试。把这场运动的领导阶级及其代表人物视为“统治阶级”，势必混淆新兴与腐朽、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这是不符合 19 世纪末中国的社会实际的。

戊戌变法运动曾在多方面给腐朽的封建制度以有力的冲击。

经济上，维新派要求保护并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以自强图存。

维新派为了救亡图存，在变法过程中始终把摈除国内封建弊政，抵制国外资本主义侵略，与发展本国工商实业这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们借鉴日本和英美等国富强的历史经验，尖锐指出：有些人生于今日却对西洋的富强视而不见，甚至吹嘘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自安，“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他们简直是“无目者也”，是“狂易失心之人”^①；在全球进入工业世界的今日，如果仍然闭关、守旧，不变革旧制，不积极发展工商实业，国家就只能永远陷于贫弱、受欺的可悲境地。他们强烈要求尽快革除一切障碍民族资本发展的陈规陋习，大声疾呼劝工惠商，准许、鼓励、保护民间开厂^②，并且在“百日维新”中，制定、颁布一整套变法维新的措施。其中仅经济方面就有：设立银行、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各省设分局），提倡兴办实业，甚至兵工厂亦准私人开办；奖励发明创造，凡是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等各种有利生产发展者，即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整顿厘金、清查屯田地亩、制定征租规章，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编制国家预算，公布收支情况，等等。这些措施没有触及土地制度问题，是一个严重的弱点。然而，贯彻实行这些措施，却必将加速自然经济的瓦解，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壮大。

① 严复：《论世变之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以下简称《丛刊》），第 74 页。

② 《丛刊》（二），第 141～142 页；第 281～282 页。

政治上,维新派激烈批判封建主义,要求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封建君主专制制度。

资产阶级维新派以上书、演讲、组织学会、出版报刊、兴办学校、翻译西书等多种方式,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抨击腐朽的封建思想和政治制度,尖锐指出,纲常名教这套“中学”和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是弱亡中国的病源。他们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批驳“君权神授”。谭嗣同甚至说,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情,就应该废除他,这是“天下之通义”^①;而二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却是专制暴政,“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②。清朝统治者也是一些虎狼,搞得中国成为黑暗地狱,“直无一法一政足备记录,徒滋人愤懑而已”^③。他们的结论是: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一个根源^④。

维新派反复强调“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赖以富强的根本。康有为前后七次上书光绪帝,几乎都直接、间接地论述或提及这一问题。百日维新期间,他又专折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此实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⑤。不难看出,“兴民权”、“开议院”被维新派作为变法的政治纲领而加以鼓吹,其矛头直指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武器纲常伦理。不管有些维新志士曾经在某些场合表白无意从根本上推翻旧制度,也不管他们当中某些人的主观意图如何,戊戌变法反映了中国民族资

①③ 《谭嗣同全集》,第56、341页。

② 严复:《辟韩》。《丛刊》(三),第81页。

④ 康有为说:“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丛刊》(二),第236页);梁启超说:“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28页)

⑤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丛刊》(二),第236~237页。

产阶级要求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用相对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替代封建制度的强烈愿望,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变法过程中尖锐、激烈的斗争昭示:它不是某些企图“补天”的封建文人一种矫揉造作的空言粉饰,而是一场真真实实的资产阶级社会变革运动。

关于这一点,清朝反动统治者的言行也可佐证。清末的顽固派,是一些麻木不仁的昏庸老朽,在诸多庶务上都表现出末世的征兆。唯有一点例外,那就是他们对变法维新将给“乾纲独揽”的君主专制制度带来严重的威胁,表现出异常的敏感,认为变法将使中国“变为泰西民主之国”,而他们这些封建“忠臣义士”则将无噍类^①。因此,变法的要求一提出,他们就把康有为视为狂生,多方阻挠维新活动;他们集中攻击维新派的政治主张,诅咒提倡平等、民权是禽兽之行,诬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如果人人得申其权,那就会天下大乱,“不灭尽人类不止”^②;他们纠集反动势力捣毁变法的宣传机构,解散变法团体,殴打维新志士,直至捕杀一些代表人物。这就从反面说明,变法运动确实触及根本制度的变革问题。须知,君主立宪不是封建的而是资产阶级主要的政权形式之一。把这样一场政治运动说成仅仅要求改变旧事物的某些枝节方面,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里涉及怎样认识在 19 世纪末、也在整个近代史上,中国社会这个“旧事物”的“质”,以及变法同它的关系问题。人们公认,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戊戌变法

① 《邵阳上民驱逐乱民樊榘告白》。《翼教丛编》卷 5,第 3~4 页。

② 张之洞:《劝学篇·正权篇》。《张文襄公全集》卷 202,第 23~24 页。顽固派攻击民权尤烈。

运动,不也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吗?不也是为了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这个旧事物的“质”,使中国能够走上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吗?谭嗣同等维新志士殷红的鲜血,并不是用以涂抹封建庙堂的,而是浇灌了民族解放的鲜花。问题既然如此,却说他们不想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岂非自相矛盾?

那么,在近代中国有没有只想作一些枝节改变的人呢?有,这就是以奕訢、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作为发起封建地主阶级自救运动的洋务派,他们并非一概不变旧法。19世纪中叶的顽固派,把西方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一概加以反对。洋务派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这种愚昧自大、闭关自守的旧法,购置机器,聘请洋匠,翻译西书,开办一些由他们把持的军事、民用工业,设立学堂,派遣留学生等等。所有这些,正如维新派指出的,都是对旧法的“稍变”^①，“乃西人皮毛之皮毛而已”^②。洋务派稍变旧法的实质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敝”^③,非但不触动,反而要维护并进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这个根本旧法。这种“温和主义”的做法,即使再过15年,也于国家的富强无补^④。维新派的这些认识,确乎触及了洋务运动的基本弊病。这也是他们较之早期改良主义者高出一筹的地方。因此,改变还是维护封建专制制度,是维新派同洋务派的一个最基本的政治分野,也是区别这两场运动的不同阶级属性的一个基本因素。

总而言之,戊戌变法是中國民族资产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次勇敢的政治尝试。这场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带有一定群众性的、实实在在的社会变革运动。

①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丛刊》(二),第129页。

②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三。《丛刊》(一),第277、275~276页。

③ 严复:《救亡决论》。《丛刊》(三),第68页。

二

戊戌变法既然是一场社会变革运动,那么,说它的目的是要阻挡人民革命运动,也就站不住脚了。必须指出,所谓“人民革命运动”一词,本身就含混不清。在 19 世纪末,何谓“人民革命”?

第一,是指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吗?当时的中国无产阶级尚处幼年时期,除了神话新编,有谁会说当年的中国无产阶级可能领导什么革命运动呢?

第二,是指农民革命运动吗?颇像。因为维新派确曾以农民起义警告、劝说光绪帝尽快实行变法^①。可惜,这个故事并不能证明他们要阻挡革命。近代中国,历史赋予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使命基本一致:都要反侵略、反封建。“今日之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②,谭嗣同的豪言壮语,“戊戌六君子”血洒燕市,都证明维新志士日夜筹划、发奋变法,根本目的是企图完成上述使命。

其实,维新派谈农民革命,另有原因。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这决定了它对待劳动人民和群众运动也具有两面性。维新时期康有为等人谈论农民革命的可怖,就是维新派软弱性格的表现。他们要求改革现状,又不敢诉诸广大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的激烈行动,于是祈求于开明君主的声威。但光绪帝却犹豫不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谈论农民革命,主要是逼迫光绪帝尽快接受他们的变法主张。

第三,如果说“人民革命”是指资产阶级革命的话,那么,我认

① 康有为多次以农民造反来警告光绪帝,说甲午战后“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耜于陇上,石勒倚哨于东门,所在而有,近边尤众。……即无强敌之偪,揭竿斩木,已可忧危”(《丛刊》(二),第 192 页),要光绪帝赶紧维新,使国家强盛。

② 《谭嗣同全集》第 303 页。

为戊戌变法同资产阶级革命在当时条件下不仅不是对立的,恰恰相反,两者代表着同一阶级的利益,为了达到一个基本相同的终极目标而进行的两种不同形式的社会变革运动。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存在着两个不同的阶层:刚刚由官僚、地主、富商转化过来、资本较为雄厚的那一部分属于上层;由普通民间工商业者发展起来的和一些华侨资本家属于中下层。康、梁这批戊戌变法头面人物,主要是代表上层的要求,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则主要反映中下层的利益。两翼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地位存在差别,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关系深浅也不同,前者较之后者同内外反动势力有着更多的联系。两翼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和社会经历等方面,也不尽一样。这些差异,使民族资产阶级的两翼在如何看待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上显现出来。前者比后者,软弱性和妥协性表现得更为严重。因此,在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时,两者选择了不同的方式,是不足为怪的。但这一差别并未超越阶级的界限,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存在着共同的阶级利益,这就是反抗内外压迫,改革现状,发展资本主义。

历史事实说明,在戊戌变法时期,尽管孙中山已经组织革命团体并积极开展活动,却尚未形成一股潮流。因此,不存在康、梁一派阻挡、对抗孙中山一派的问题。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应该视为这个阶级的两翼在早期寻求同一变革目标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不同尝试。

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作出变法维新的选择,并且能掀起一场其规模和影响都远较革命派的活动大得多的政治运动,是这个阶级尚不成熟所决定的。

应该看到,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自上而下进行变革的可能。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不乏其例的。就拿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而言,有法国的革命方法,也有日本、俄国、德国的方法。被列宁称为“革命和改革”